

9·30运动和国家罪行第十三章

9·30运动之后的印尼共产党（1）

原创 萧玉灿 印尼视角

来自专辑930和国家罪行

萧玉灿 著
萧忠仁 编
陈浩琦 译

第五章
9·30运动之后的印尼共产党

01

批评与自我批评

在9·30运动之前，在学生中，阿里尔汉姆学说和艾地的《两个方面》的论文，已得到广泛的讨论。《两个方面》指出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的力量由两个方面组成。一个方面是亲人民的力量，第二个方面是反人民的力量。为此，艾地指出，印尼共产党应该努力加强亲人民的方面。

当苏吉奥诺在1965年获得博士学位从平壤返回时，有关《两个方面》论文的争论变得更热烈起来。平壤反对《两个方面》论文，认为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。而苏吉奥诺却完成了基于“两个方面”理论的博士论文。尽管朝鲜并不乐意，但还是把博士学位授予了苏吉奥诺。

9·30运动之后，1965年10月，来



1965至1966年，印尼发生了针对有共产党嫌疑以及同情共产党人士的大清洗。

自西爪哇的印尼共产党的杜东和伊斯梅尔·巴克里积极推动对9·30之前印尼共领导层的各项政策进行分析，但无法联系到仍健在并藏匿在雅加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迪斯曼。一些印尼共的主要人物，如曹德崇、艾哈迈德·苏马迪、杜东和苏马尔索诺等，决定在雅加达巴刹名谷开几天讨论会。会议产生了一份书面文稿，最后通过一个华人交通员送交苏迪斯曼审核。

文稿送交苏迪斯曼后没过多久，曹德崇和艾哈迈德·苏马迪被捕。

苏迪斯曼收到此文稿后，便忙着修改

完善它。其中苏迪斯曼研究的资料之一是毛泽东的文章《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》，该文深入剖析了议会斗争不可能实现胜利的问题。

由此诞生了《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》的文件，称《两个方面》论文是错误的，应该支持开展武装斗争。

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和监狱内有人叛变，很多参与提供开会地点的人和印尼共产党领导人的交通员，都进了监狱。

02

武装斗争

《批评与自我批评》作为印尼共产党领导层的文件发表并

秘密流传后，尚未被捕的印尼共领导人觉得有义务执行《批评与自我批评》中的指示或号召，于是便产生了南勿里达项目。

南勿里达遂成为印尼共产党进行武装抵抗的根据地。此行动始于1967年年底。由于在短时间内准备不充分，此军事行动在1968年被苏哈托军事当局摧毁。参与南勿里达的印尼共领导人和党员被捕。领导人之一奥罗安·胡塔佩亚在战斗中被枪杀。南勿里达事件推动苏哈托将军更猛烈地进行大规模逮捕，被捕人员中还包括很多武装部队的军官。

在监狱中，有关南勿里达武装斗争的讨论十分热烈。一些人认为，南勿里达行动是冒险主义的行为，是靠不住的。还有些人认为，因为南勿里达事件，苏哈托将军取消了释放大批政治犯的计划。囚犯中最猛烈抨击南勿里达项目的是印尼共中央委员西达尔托佐。

还有些人认为，南勿里达项目应根据各种事实来进行分析，不能只是因为它失败了而被谴责为冒险主义。这些人认为，如果同意和支持《批评和自我批评》，就应该进行类似于

南勿里达的活动。在农村，农民和工人被动员起来参加武装对抗苏哈托军人政权的活动。

全印尼劳工组织中心领导人穆罕默德·穆尼尔也是南勿里达项目领导者之一，他在受审时明确指出，根据伊斯兰教教规，被追捕的个人或组织有权抵抗。因此，他宣称，南勿里达武装行动是不应被谴责的活动，因为印尼共产党受到苏哈托军事政权的残酷追捕和攻击。

1968年政府军突袭南勿里达时，穆尼尔等许多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被捕。他在狱中给了我很多有关南勿里达的信息。

失败问题的根源之一，是到达并居住在南勿里达的印尼共领导人无法适应农村生活。他们不习惯于做乡下人。

当地居民很欢迎并热情接待印尼共产党领导人。当有会餐时，当地百姓总是把这些领导人当作尊贵的客人，把食物献给他们。

然而，当地居民对这些印尼领导人的欢迎却使他们忘乎所以，以为自己是个人物，不能和乡下人融洽相处，不愿和他们一起住，不与他们合